

# 旅行在抗战大后方是何种体验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,摧毁了原本的交通动脉、截断了铁路与航运。但对身在后方的芸芸众生而言,该出的远门还是要出,该探访的亲戚还是要去,更不要提富贵险中求的商人和出公差、赴新任的公教人员。大量流动的人群,压向远没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和那么多设施的后方,促进了客运、住宿、餐饮的发展,也留下了不少独特的衣食住行回忆。

## 困难行

全面抗战中期,大后方民用航空还在勉强维持,从缅甸或越南经昆明至重庆的航班,几乎是唯一的对外管道。票价高昂、一票难求自不待言,即便买到了票,也不一定准能搭上飞机。

那时的民用航空原本就容易受天气影响,加上日本飞机袭扰,并非每天都有航班。旅客买票后,航空公司将名字排进候乘名单里,根据每天的实际情况依次通知。航班类似火车一样分段售票,但不时有人买了半程,抵达目的地却拒不下机,要坐到终点再补票。有时航班几日不能成行,起飞时就装满客货,中途降落只为加油,那些中途要上机的旅客只能顺延排队、望机兴叹。

1941年5月,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主席梅贻琦、总务长郑天挺、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,从昆明前往四川、重庆公干,好不容易买到3张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,但当天飞来的

“南京号”飞机超载,昆明的乘客无法尽数上机,只有梅贻琦一人成行。6天后,罗常培已经排到了第一位,却又因一名官员插队,他被挤到了后面。又过了6天,来的飞机在昆明可以上10名乘客,郑、罗两人才得以到重庆和梅贻琦会合。

这还只是排队难,毕竟人是安全抵达了。抗日战火下,民用航空除了原本的事故风险,更“难走”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生死关。1938年8月4日,中航“桂林号”飞机从香港飞重庆,途中遭5架日机扫射,迫降于广东省中山县境内,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14人遇难。

坐飞机如此危险,搭乘火车同样不轻松。抗战步入相持阶段,国内铁路干线所在区域多已沦陷,陇海铁路郑州至宝鸡一段成为仅存的干线。但日军在1938年3月占据了山西南部的风陵渡,架设火炮隔着黄河轰击陇海铁路往来列车,对面的潼关一段成为最危险的道路。火车抵达潼关前,往往停车等到天黑,关闭一切灯光后加速通过,以求降低日军炮火的准头。

相比之下,搭乘汽车好像更安全一些。身处后方,除了日军空袭、土匪打劫,似乎没有其它“天敌”存在。但是,资源紧缺之下,民用车辆往往过度使用、凑合维修,半路抛锚是家常便饭。影响旅行的不仅有车,还有路。当时大部分公路只是夯土道路,不但暴土扬尘,在连日雨水作用下还会坑陷、崩塌,使车辆陷入危险之中。

## 艰苦住

有行有止,住宿是旅行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。北京、上海等城市,不乏从大酒店到小旅馆的各种住处。但后方县份本就闭塞,没有什么现代旅馆。当抗战期间这种现状与压缩到后方、又见过世面的旅人碰撞,留下的记录就丰富了起来。

粤军名将蔡廷锴在战时后方的旅行经历,可为当时的住宿条件做一个注脚。1942年末,卸任粤桂边区总司令一职的蔡廷锴,计划从广西出发前往云南、贵州一游,再到重庆。蔡廷锴有小汽车可搭,行不是问题,但当他离开广西进入贵州,住的问题立刻凸显。

“至夜深一点钟,尚未入眠,跳蚤又光顾,臭虫频频来犯,周身不适,痛痒非常,不得已起来与之周旋,但房中之灯光如豆,待翻开被窝,在咸臭的棉枕下,蒙蒙地看见一群臭虫如蚁附膻,毛骨悚然,结果使我避之三舍,将我所带小毡铺在地板而睡,稍觉安眠。”这家位于桂黔两省交界的“华侨旅社”条件如此恶劣,以至于表针指向6点,蔡廷锴就跳起来催促司机出发。

旅程最恐怖的一夜,发生在四川綦江县的东溪镇。蔡廷锴回忆,晚上十点开始,“尚未入睡,老鼠结伴而来,好似大军出阵一般……起来燃着油灯,数次将其驱逐。但鼠也有它的游击战术,我一动,它则隐藏,不久又来骚扰”。蔡将军无可奈何,僵持到半睡半醒间,油灯灯芯都被老鼠拖走了。

蔡廷锴选在冬天出行,住宿时还只是臭虫、跳蚤、老鼠骚扰。前述梅贻琦、郑天挺、罗常培一行三人赴川渝公干,选在5月出发,6月才成行,在最热的季节旅行了三个月,住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最难受的是热。罗常培写道,即便住在泸州第二十三兵工厂通电的宿舍里,以当时属于先进事物的电风扇吹到晚上12点,“还是热得睡不着觉”。

酷热之外,打扰睡眠的还有蚊虫。梅贻琦的日记里,常有旅途住宿时被蚊子打扰的记载。“帐中忽现蚊子,起坐捕打,打死后又再来者,打四五个后已疲乏,只作不闻,渐渐入睡”,“帐中捕得饱蚊二个,打得两手殷红”等等,不一而足。

不过,战时后方也有认真经

营的旅馆,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中国旅行社在各地开办的招待所。中旅在西南后方开办了多处旅行社,派遣精干员工悉心经营,很快成为后方旅行者交口称赞的品牌。梅贻琦一行对泸州蓝田坝中国旅行社的评价不低,“这里房间清洁,招待周到,定价低廉,比旁家旅馆好得多了”。到了叙永,又发现这里的中国旅行社“铺着地毯,摆着藤椅,亦堂皇,也雅致,简直不像是僻处川南的内地样儿”,罗常培如此评价。

## 勉强吃

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后方,旅行已然不够便利,路上如何填饱肚子,还不拉肚子,更成了件要紧事。

全面抗战初期,吃本不是问题,尤其是对有能力长途旅行的官员、学者来说,口袋里的薪水足够支撑生活。历史学家郭廷以回忆,“四川物价低廉,一块钱可以买八九十个蛋,招待客人花几毛钱就够了”。

后来物价逐渐上涨,梅贻琦一行在重庆吃一顿烤鸭,就花去70元。蔡廷锴在广西吃两碗粥,花掉7元,还感慨比战前物价上涨十倍有余。此后,物价暴涨,郭廷以说“伙食也差了,最差时买的米、面粉都不好,还有长虫的,很难下咽”。

不过,旅途上价格不重要,关键是要有的吃。梅贻琦一行在泸州,可以吃到鸡丝粥、火腿蛋、面包、红茶的早餐组合;在成都,饱尝过江豆花、甜咸烧白、豆瓣鲢鱼等川味。在路上碰不到好饭馆,也能“喝些稀饭,吃点肉面”。但待到汽车抛锚时,只能找到村民买米,虽然村里“几间茅屋脏得不堪”,饭也煮得半生不熟,但好歹有的吃。

比起天府之国四川,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,人无三分银”的贵州就更逊一筹。海军在抗战时大举迁入贵州,出差到黔的海军军官郑天杰发现,盐在当地极为珍贵,市场上都是按两来卖。餐馆里面做饭,厨子在烹调完毕后,拿着岩盐块沾一下,就算是完成调味了,这让留过洋的郑天杰大开眼界。这样做出来的菜,当然不好吃。

伴随着困难的行、艰苦的住和勉强的吃,万千旅人在战时大后方穿梭行走,他们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坚持着工作和日常,支撑着中国人迎来胜利曙光。 据《同舟共进》王戴/文

## 顾景舟为艺术“偷懒”

顾景舟是紫砂陶艺界的“壶艺泰斗”,但坊间传说他有点“偷懒”。

1948年,顾景舟在上海铁画轩售卖的一把壶是八斗米,这价格相当不错了,供不应求。

顾景舟当时的家境还没“脱贫”,铁画轩老板上门催促他多做几把壶,顾景舟不急不缓地说:“多做无益。”老板说:“换成别人早就日夜赶工了。”顾景舟说:“请问你是要量还是要质?静下心来读书思考之后做的壶,这浸润着岁月的器物其实比钱还值钱。”老板尴尬地笑笑,发现顾景舟家虽清贫,但整洁干净,特别是满屋的书引起他浓

厚的兴趣。相比上海,顾景舟家乡当时可谓穷乡僻壤,方圆十里没几个识文断字的,他一个做壶的却拥有满屋子的书籍。当看到顾景舟的两本枕边书,老板更是惊讶,一本是《长物志》,一本是《文会堂琴谱》,他怎么也想不出这跟做壶有什么关系。顾景舟说:“做壶而不读书,最多获得技;做壶而读书,特别是读闲书,很容易获得艺。拥有技的人只能成为匠人,为糊口而忙碌,因此平庸;而拥有艺的人才能品尝到做壶的乐趣与幸福,为艺术而忙碌,因此与众不同。”

据《做人处世》张炯/文